



□原因

生命的水滴与时代的江河同行,记忆的溪流曲曲弯弯却又长……

在废墟被蓝图照亮的新中国成立初期,来自湖南的父母,主动申请调往白族聚居的云南省剑川县教书育人。襁褓中的我,也就随之在那里安身。听五星红旗在耳旁啦啦招展,《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红岩》等红色经典伴着我茁壮成长。

但道路总是曲折的,岁月无奈地闯进了一个迷宫。1969年1月,15岁的我被安排到剑川县最偏远的山区沙公社插队落户。在那贫瘠的农村,我们生活的主旋律是困苦。几块土壑在地上围个框,铺上稻草,裹一床薄薄的棉毯,就是被回荡在山谷的犬吠伴眠的夜晚。一锅干蔓荃汤里撒几把包谷面粉搅一搅,就是我们的一日三餐。有一次在粮管所排长队领到了救济粮,我们竟



砚田风采照人间

——和田本相先生交往侧记

□宋 娜

3月5日,同门和其他好友陆续转来田本相先生去世的消息。我先是错愕,觉得不可思议,因为我3个月前还曾去田先生家拜访和请教过他。那时候田先生除了有些消瘦之外,看起来似乎一切如常。春节期间听一位师长谈及他病重,我还不以为意,觉得哪里有那么夸张。没想到现在,他却永远地跟这个世界道了再见。消息证实后,我长时间沉浸在懊丧和遗憾的情绪中。

我不是田先生的学生,却因为博士论文的关系拜访过他,和田先生有过一些交流。论文开题后,导师邹红曾就选题范围和个案选择跟我反复酌定。考虑到田先生的传记是重点阐释和分析的对象之一,邹师跟我说:“你去拜访一下田本相先生吧。他的《曹禺传》至今在学术界都是不可超越的,奠定了曹禺研究的基础。请他给你一些意见!”我自然心下大喜。田先生是国内戏剧研究领域的泰斗、曹禺研究专家,能得到他的指导,对于厘清思路自然会事半功倍。

邹师的《田本相和新时期曹禺研究》发表在核心期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上,是一篇影响力较大的文章,对田先生学术风格、地位、影响和意义都进行了客观而不失公允的系统评价;而后来见到田先生后,他则跟我提及,邹师是第一个从精神分析角度研究曹禺的作者。

我随即找机会跟田先生通了电话,并提前把开题报告和论文提纲发到了他的邮箱。很快,大约过了两周,田先生约我去他青年路附近的家里一见。

进得门来,却见田先生已经沏好了茶。

“对戏剧家传记整体研究是有意義的,别人还没有专门写过。有一篇专门研究田汉传记的,你可以找来看看。”田先生开门见山地说。

我赶紧记下来。田先生又说:“戏剧家传记里写得好的,有董健的《田汉传》。1985年国内

清代书法家伊秉绶有言,“惟砚作田,咸歌乐岁,墨稼有秋,笔耕无税”。

田先生的微信名是“砚田”,不知是否来自这一典故。以砚田为名,这也是他对自己以笔为犁、以砚为田而笔耕不辍的形象写照。而这方砚田,不但给现代文学、现代戏剧研究开拓了一片独特的学术原野,还映照出一代学者睿智、平和、包容而又爱憎分明的人格光辉。

在武汉召开了一个田汉研讨会,学术界这才引发了田汉研究的高潮。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要出版田汉传记,我向他们推荐了董健。他写得不错,值得研究。另外,夏衍传记也要加进来。夏衍在戏剧史上的意义很大,他是左翼戏剧,但却不是说教式的。夏衍传记写得好的有陈坚,你可以考虑加上。”

这是建立在他对现代戏剧史和传记创作实践上的经验之谈,都是高屋建瓴而又宝贵的意见。他给我的研究建立了宏观视野和高起点,我如获至宝。那天和田先生相谈甚欢。他亲切、平和,身上没有时下一些学者爱端的名士架子,也没有“大牌”脾气,更不存在什么功利心,有的只是对学术的热爱和对晚辈的一片关心和爱护。谈话如沐春风,我的拘束少了很多,思路也开阔了很多。

这次见面没过多久,田先生又在微信中嘱咐

我多看外国名人传记,“如果你写传记就多看看看外国作家写的名人传记,我也是学别人的。”我想起来田先生在《曹禺传》后记中曾多次提到罗曼·罗兰、茨威格等人的传记,赶紧买来看。没过几天,他又转发关于莫砺锋《杜甫评传》的一篇文章,供我参考。接着,他又转给我一篇《学术论文的六个关键方面》,提醒我注意学术论文的规范,如何选材和提出论点进行论证。他不是我的导师,却又这样关注着一位籍籍无名的后生晚辈的论文进展。我心下默想,只有把这份感动化为思考力和笔力,及早把论文写出来,而且写出深度来,才对得起他的关注。

论文初稿出来后,我赶紧提前发到了田先生的信箱,请他给予指导。大概一个月后,田先生约我见面,发来信息说:“对不起,最近才看完,如果下周一有暇,可于下午三时来家里一叙。主要是身体欠佳看得慢了。”他语气客气而真诚,我则

十分不安而惭愧,为田先生的认真、负责而再次感动。这本来就不是他的分内事,是我在打扰他,增加他的额外事务。他提到身体欠佳,迟钝如我,还以为只是冬季易发的感冒一类小事。现在想来,可能那时候田先生就已经身染重荷。

到了约定的当天上午,田先生一早发来信息说,“医生通知我下午住院复查,如果你上午有空来家里谈也可,要不就不等我出院再说。”因我的单位距离他的住处不远,我赶紧回复:我现在马上去。上次见他还很硬朗,可能只是一般的复查,我依旧没有多想。

及至我赶到田先生家里,见家里氛围一切如常,只是客厅里多了一张医用床。田先生的爱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可能是怕打扰我们,声音开得很小。田先生则消瘦得厉害。我这才觉得情况有些严重,连忙问:“您身体怎么样?”田先生说:“没什么大事。就是例行复查,可能要住一阵子医院。”我说,“您比上次我见您时瘦了很多。”他似乎并没有放在心上,不过又认真地回复我说:“体重掉得不多,还是49.5公斤。”我不禁赧然,觉得他似乎不愿意多谈自己的身体状况。看他神情淡定如常,我又侥幸地想,不至于有什么大事情,也就没有再多问。

田先生家的餐厅靠近客厅,我们分坐在他家饭桌的两侧。田先生双手撑在桌上,头略下沉。毕竟已是86岁的高龄了,这可能是身体机能弱化的一些正常反应,我想。

谈到论文,田先生说话依旧思维清晰、逻辑严密。他对我鼓励有加,肯定我做了一些基础工作:“你写的资料很扎实,下了功夫。”然后,他又对《曹禺传》的独特性做了说明:“把访谈的东西加到里面,这种写法过去的传记中还没有。”又谈到曹禺的“苦闷”:“曹禺为什么苦闷?我原先读过心理学的东西。对曹禺苦闷的发现,影响了以后

无法复制的。

如今我虽然已出版十余本作品集,并且一本比一本厚,装帧也越来越华美,思想性、艺术性的日趋完善和成熟也显而易见,但最初的作品,仿佛初恋一般最被我珍视,也许更是因为怀念那个“像健壮的青年,有着铁一样的胳膊和腰脚”的80年代。80年代已经不复存在,人们的需求也不复当年。文学已从异乎寻常的高位跌落,成为阅读的支流、启蒙的、审美的纯粹,有时候已无可奈何地让位于娱乐的狂欢。这是时代的蜕变。

回顾数十年历程,先是物理教员,继是文联干部,在后来的20多年时光里则成了一名繁忙且经常上夜班的报人,自己的文学创作就一直处于业余状态,作品数量较少。“一位作家,作品量多而质高才最值得推崇。可惜我难以做到,也就只好把文章尽可能写好一点了。主观努力如此,客观效果如何,不得而知。”在散文集《听雨》的后记里,我曾这样说。“我要唱的歌,直到今天还没有唱出,每天我总在乐器上调理弦索”,泰戈尔的这句话,是我一直坚持的理由。

尽管春天甚至盛夏已经过去,至少对于我的生命而言,然而春后还有夏,夏后还有秋,秋后还有冬,冬后又是春。日子就是这样,涨落起伏、周而复始。告别冬天,走过杂花生树、莺飞草长的春季,其实我们的社会生活也进入了夏秋之交。这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季节。眼前一派繁茂却良莠芜杂,收获似乎丰赡却斑驳迷离,物质涌流的同时雾霾腾起,并且向人心流泄。需要梳理,需要整饬,需要涅槃,需要跨越萧瑟的轮回,重新唤起一种明澈和清丽。我一次次暗暗警醒自己,为了给这种跨越增添一点哪怕是微末的色彩,也应一手举起批判的长矛,一手摇动爱与美的玫瑰,进行属于自己的写作。环顾四野,我发现雾帐撩起处依然有无数的年轻人点燃了他们心灵的火把。这些才华横溢而又目光深邃的幸运儿,不像我们一样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他们的成长,营养优质而完备;他们的歌声,不仅掷地有声,而且燃跳着青铜和经火的火焰,尽管这个世界已是五音俱发,但我相信,文学是无法替代的。他们才是即将到来的日子。我不仅要为比我年轻的写作者点赞、喝彩,也希望多与他们交朋友,获得与他们砥砺交流的机会。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又想起了40多年前校园里的那场舞蹈。那飞溅的欢乐是由衷的火苗,更是历史翻新的象征、和新中国一起成长的一代人,用重重叠叠的脚印追邈刻写的是奋斗和艰辛的历程。应该一如既往地前行,和祖国一起去迎接更加耀眼的荣光。我们虽已老去,但新中国依然有着铁一般的胳膊和腰脚。沧海万切,众流成也。我希望在祖国一次次跳起的青春圆舞曲里,人们能认出其中舞步蹒跚却又在沟壑纵横的脸上绽开朵朵鲜花的那一个是谁。

是纪念。

